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就业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姜磊,杨洁,郭玉清,张馨月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视角,运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探究了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对企业就业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不同核心解释变量指标、不同样本设定以及工具变量回归中均保持稳健;这一负向影响主要针对非国有企业,且在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多元化政绩考核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因势利导作用,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释放企业的就业吸纳潜力。

关键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企业就业;新结构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1)05-0017-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年均增速超过9%的经济奇迹。然而我国就业人数却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增速相适应的扩大趋势,就业难依旧是社会民生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2019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再次指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具有重要地位,且在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稳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衡量就业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弹性,即就业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我国就业弹性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研究这一现象的文献将其原因归纳为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1]、不利于吸纳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2]、非正规就业的存在等^[3]。已有研究未能刻画出政府在财政支出背后对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重要考量。此外,宏观层面的就业数据往往忽略了异质性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性,从而难以识别就业水平偏低的微观传导机制。工业企业作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贡献者,具有较大就业吸纳潜力,研究影响其雇佣人数的政策因素,一方面有助于明确政府不当政策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就业损失,据此完善顶层设计,推进制度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政府政策产生

收稿日期:2021-07-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973069);天津社会科学规划基金(TJLJ16-001);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AS2006)
作者简介:姜磊(1975—),男,山东威海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影响的渠道,有助于加深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从而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结合两者进行资源分配,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发展战略是政府基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的综合表现。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政府要大力发展与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和技术,即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4]。相较于大量关注发展战略对国家富裕和地区发展有何作用的文献,对于地方发展战略微观影响的探索尚在进行中。其中虽有研究提及企业就业人数缩减的宏观原因^[5],但对政府产业选择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资本密集度企业面临的信贷成本和实际税负差异认识不够深刻,因而未能挖掘出政府发展战略影响企业就业的完整传导链条,核心解释变量指标选取问题和内生性偏差的存在也使得相关结论的可信度有所下降。

鉴于此,本文在深入剖析地方政府赶超战略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尝试寻找宏观政府决策到微观企业表现的传导机制。一方面,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因缺乏自生能力和技术结构限制而只能吸纳较少就业,即直接效应;另一方面,受到限制的遵循比较优势企业往往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和实际税负,不得不削减用于劳动力的支出,因而雇佣人数十分有限,即挤出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本文提出的经验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稳健的结论。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政府赶超战略对企业就业人数的负面影响有所不同,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到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及可能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拓展了政府发展战略微观影响方面的研究,已有文献忽视了释放微观主体活力对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对中国工业企业雇佣劳动人数的作用效果,是新结构经济学微观实证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为企业就业人数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企业雇佣人数不仅会受到企业现金流、生产率等个体异质性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政府信贷优惠、财政补贴等外部政策变化的冲击,深入剖析不当的政府干预措施如何减少企业就业人数,在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深远、稳就业压力加大与“十四五”时期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重大任务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第三,发现地方政府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会导致企业就业人数显著减少,且这种负面冲击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强烈。深刻的理论分析和较为严谨的实证过程增强了上述结论的说服力,有助于加深对政府决策影响企业行为具体路径的理解,从而制定出更加切实有效、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主要与两支文献相关,一是研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文献,二是研究企业就业的文献。

1.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关研究

已有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研究主要关注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结果,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从宏观的视角来看,造成发展中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主导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则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6]。付才辉等^[7]和 Lin 等^[8]还分别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和“卢卡斯悖论”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资本外流问题作出了解释。陈斌开等发现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的赶超战略会延缓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中虽提及就业问题,但未对其进行深入探讨,而是落脚到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9];不同于大多数文献对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消极看法,邓宏图等认为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当重工业资本存量比重超过某一临界值时,才需要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变^[10]。

另一方面,在微观企业层面,地区比较优势对企业传导机制的存在在逻辑上支持了研究各地方政府发展战略微观影响的必要性,相关研究表明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发展战略会导致企业就业量减少,使之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显著降低^[11]。其中,康志勇虽探讨了赶超行为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增加的抑制作用^[5],但重在强调有偏的技术进步这一渠道,而对发展战略本身的关注不足,且实证分析中缺乏对于核心解

释变量的精准设定和对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处理。还有文献关注企业本身对于比较优势的偏离^[12-13],但更强调异质性企业的发展选择,对于统筹地区发展的地方政府借鉴意义不强。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发展战略所带来的国家发展与地区差异,着眼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或一国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宏观经济稳定有赖于微观主体活力的充分释放,分析发展战略对微观企业影响的文献近年来虽在不断增加,但缺少对于政府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影响企业就业的规范研究。考虑到工业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具有强大的潜在就业吸纳能力,本文使用1998—2013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对地方政府发展战略在企业层面的就业影响展开实证分析。

2. 对企业就业的相关研究

企业异质性是企业就业水平的直接影响因素。企业成立年限、所有制、所在地区不同,其就业创造能力也存在差异,这为本文实证回归中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异质性影响的分析提供了思路。此外,资产负债率更高、生产率更低的僵尸企业会通过挤占信贷资源和扭曲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对正常企业的就业增长造成显著排挤,这不仅阻碍正常企业释放潜在就业机会,还会挤出在位劳动者;由于信息技术对简单重复劳动的替代,信息资本投入更多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数量会更少。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所处的贸易环境及其贸易投资决策也会对就业人数产生影响。中间品关税更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企业就业吸纳能力更强;而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外销型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则会显著降低企业就业规模^[14]。

政府行为也会影响企业就业人数,但相关研究仍显不足。郭长林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发现,低效率的财政投资支出扩张会通过拉高中间品价格抑制民营部门就业,进而压低总体就业水平,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简单划分以及宏观季度数据的使用,掩盖了企业微观特征导致的就业吸纳能力差异^[15]。毛其淋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果表明,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会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且这一效应随企业相对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强^[16],然而,文章重在强调市场的地位,忽略了有为政府对增加企业就业人数的积极作用。

综合来看,研究企业就业的已有文献更多探讨企业自身微观特征的影响,对于政府行为影响微观就业效应的关注不足。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揭示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意在为缓解我国就业压力问题探索新的方向,这对于丰富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三、理论假说

林毅夫提出以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为标准,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F)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又包括政府人为提升经济系统中的产业、技术结构(即实施赶超战略),和政府出于利益考量保护落后产业两种情况^[6]。本文将这一概念从国家层面缩小到地区层面,分析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战略,并且重点关注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将行政权力逐步下放到地方,各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管理权与决策权。与此同时,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摆脱了过去的大包干模式,地方政府在事权之外还拥有一定的财权。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形成了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设法利用一切可获得的资源谋求地方经济增长,从而在“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取得仕途升迁,在这一模式下行行政权力集中与晋升激励得以兼容。

资本作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强的要素,成为各地方官员关注的焦点。为了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扭曲要素价格、优先配给融资、给予财税补贴等方式扶持本地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此外,各地方还将招商引资置于重要地位,政府人为干预地方产业选择、降低外资引入标准,甚至以破坏当地环境为代价,引入大量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本地经济增长进而自身晋升的筹码。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上相对低廉的资本要素价格,使得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历史上出于备战目的发起的“三线建设”在部分地区建立起大规模国防、科技产业,也对当地产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样的产业与技术结构往往并不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不

利于企业充分吸纳就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信贷优惠、财政补贴往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的情况下,银行将信贷成本转嫁给未受到扶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其贷款利率,民间信贷市场利率也由于资金供不应求逐级攀升。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较高融资成本,不得不减少用于劳动力的支出,因而雇佣人数下降。资金供给偏向与定价扭曲导致资本密集型企业出现预算软约束问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有效投资和规模扩张,阻碍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充分释放。此外,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导致的财政资源消耗会加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促使其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征管效率和实际税负以平衡财政收支。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实际税率提高对其雇佣人数造成挤出。尤其是规模越大的企业信息公开披露程度往往越高,财务记录也更加翔实,避税逃税更不容易实现,因而面临比小企业更高的税率,更难以充分释放就业吸纳潜力。地方政府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优先发展造成对纳税主体结构的人为扭曲,税负转嫁效应使得宏观层面的“减税”无法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微观层面有效落实,财政资源错配就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地,从劳动力动态变化的角度,这种挤出不仅表现为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创造,还会加速在位劳动者的离职,加剧就业破坏。

另外,受到扶持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吸纳能力有限。这类企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其密集使用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雇佣劳动力较少。此外,地方政府赶超战略导致企业的技术选择偏离经济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水平,因而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丧失自生能力;即使得到信贷优惠和财政补贴,也难以抵消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超越比较优势而产生的高昂的技术模仿成本,加上相关配

套基础设施欠缺,企业发展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就业增长也难以达到潜在水平。

基于以上理论机制分析(图1),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说: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企业就业人数的减少。

四、数据与发展战略测度

1. 数据

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来自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为了保证尽量多的样本,对所有规模以上的企业进行回归分析,但考虑到“规模以上”标准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发生变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仅使用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数据。由于存在企业错报、统计失误、部分企业规模太小或没有可靠会计系统等原因导致的异常值问题,本文的数据处理方法包括:第一,剔除重要财务指标(如固定资产净值、主营业务收入、实收资本、就业人数等)缺失的企业;第二,剔除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利润率大于1、本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等不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企业;第三,剔除就业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

2. 发展战略的测度方法

借鉴林毅夫的方法^[6],本文用各省实际技术选择指数(TCI)偏离最优技术选择指数(TCI*)的程度来衡量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构建技术选择指数TCI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关注资本劳动比,用各省工业企业数据加总得到的省工业劳均资本存量与代表各省要素禀赋结构的省劳均资本存量作比,来衡量各省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即

$$TCI_{it} = \frac{TOTALK_{it} / TOTALL_{it}}{K_{it} / L_{it}} \qua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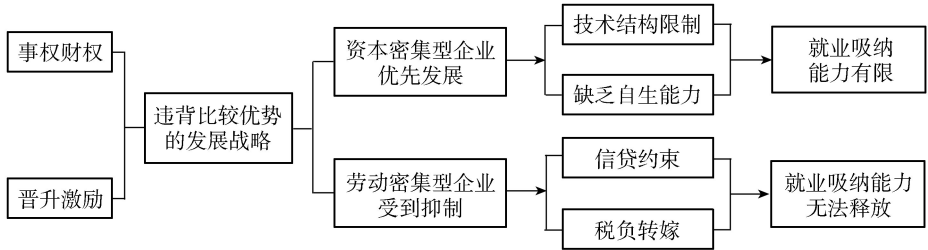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机制分析

式中: TCL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实际技术选择指数; $TOTALK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工业总资本,由各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加总得到; $TOTALL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工业就业人数,同样由各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加总得到; K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总资本存量; L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总就业人数; t 为时期; i 为地区编号。

另一种方法是陈斌开等基于劳均工业增加值进行的指标构建^[9]。由于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工业增加值和更少的就业人数,所以也可以用省工业劳均增加值与各省劳均 GDP 的比值来衡量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即

$$TCL_{it} = \frac{TOTALAVM_{it} / TOTALL_{it}}{GDP_{it} / L_{it}} \quad (2)$$

式中: $TOTALAVM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工业增加值,由各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加总得到; GDP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 GDP。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法来衡量各地区在特定年份的 TCL 。

各省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了其工业部门最优的劳均资本存量和劳均工业增加值,由此定义最优技术选择指数 TCL^* 。考虑到其不可观测性,林毅夫将 TCL^* 设定为一个常量,既不随地区变化也不随时间变化^[6],这样 TCL^* 在回归方程中进入常数项,使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一约束条件显然过强。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由其内生决定的最优技术选择指数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也必然伴随着最优技术选择指数的改变。鉴于此,本文参考陈斌开等的方法对 TCL^* 的假定逐步放宽^[9]。

首先,认为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在给定时点上为常数,即仅随时间变化,这样可以通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控制其影响;其次,认为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在给定时点和给定区域为常数,即既随时间变化也随区域变化。鉴于简化模型的考量,同时结合中国的资源分布情况,本文并未对各省份逐一设定,而是将其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①,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和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来实现对核心解释变量的一致估计。

基于以上设定,构建发展战略的测度指标 DS 如下:

$$DS_{it} = |TCL_{it} - TCL^*| \quad (3)$$

式中: DS_{it} 为 t 时期 i 地区的发展战略指标。

如果政府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则 $DS_{it} = 0$;如果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高于或低于最优水平,则 $DS_{it} > 0$ 。考虑到在中国,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往往表现为以 GDP 增长为导向,不顾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地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本文仅分析 $TCL_{it} > TCL^*$ 的情况,因而 DS_{it} 进一步简化为

$$DS_{it} = TCL_{it} - TCL^* \quad (4)$$

3. 实证模型构建

在基准回归中,笔者希望检验各省份 TCL 偏离其最优水平的程度对企业就业人数的负向影响是否存在。基准回归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ln emp_{it} = C + \beta DS_{it} + \alpha X_{it} + \mu_i + \lambda_r + \varepsilon_{it} \quad (5)$$

式中: r 为企业; $\ln emp_{it}$ 为企业就业人数,用企业报告的总员工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 DS_{it} 为企业所在省份的发展战略,用各省份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 TCL 偏离其最优水平 TCL^* 的程度来衡量,该变量前的系数 β 刻画了发展战略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基于前文对于 TCL^* 的设定,实证回归中可以通过观察 TCL 前的系数分析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的微观就业效应; C 为常数项; μ_i 和 λ_r 分别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控制变量 X_{it} 既包含可能影响企业就业人数的企业层面变量,也包含反映不同地区宏观经济环境差异的省份层面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利润率,用企业利润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示;企业成立年限,用当年减去企业注册成立年的差值再加 1 取对数计算得到;企业出口情况,考虑到出口量包含较多零值,参考李磊等的做法,对企业出口量加 1 后再取对数^[17];企业市场份额,用当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所在地区所在行业所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和的比重来衡量;企业资本密集度,用 1998 年为基期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就业人数并取对数来表示。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 增长率,用各省份 GDP 与总人口数比值的逐年增长率来表示;财政支出份额,用各省财政支

① 地区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其他省份属于西部地区。

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程度,由各省第二产业增加值除以当地 GDP 计算得到;开放程度,用各省贸易总额占 GDP 的份额来表示。

基准回归中,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本文控制了企业、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并基于技术选择指数的两种计算方法和对其最优水平的两种设定分别进行回归。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更换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指标以及样本量,并对所有企业进行了分所有制和分区域的子样本回归,以探讨地方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区域企业的异质性影响。针对内生性问题,除在基准回归中纳入众多可能对企业就业人数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外,还寻找了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最后,本文对发展战略影响企业就业人数的渠道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五、实证回归结果

1. 基准回归

基于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前三列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技术选择指数 TCI 用省工业劳均资本存量与省劳均资本存量的比值来计算,后三列回归中则用省工业劳均增加值与省劳均 GDP 的比值来衡量。第(1)列和第(4)列只控制了企业层面可能影响企业就业人数的因素,第(2)列和第(5)列回归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省份层面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由于变量较多,此处未汇报估计结果。以上各列回归均假定最优技术选择指数 TCI^* 仅随时间变化,第(3)列和第(6)列进一步放宽条件,如上文所述,认为最优技术选择指数既随时间变化也随区域变化,由于此假定最符合现实,下文的回归分析均基于此假定。由表 1 可见,所有回归中核心解

释变量 TCI 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政府发展战略越偏离当地比较优势,企业就业人数越少。根据第(3)列的回归结果,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技术选择指数每提高 1 个单位,企业层面的就业人数就减少 3.6%。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符号也与已有理论和认知相符。利润率更高的企业盈利能力更强、发展前景更好,有能力也有需求雇佣更多劳动力。成立年限越长、出口规模越大、占所在省份所在行业市场份额越高的企业往往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员工人数也越多。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就业人数越少,这符合资本与劳动相互替代的普遍观点,表明越是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重工业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弱。

2. 稳健性检验

与基准回归相同,稳健性检验部分核心解释变量前三列采用劳均资本存量之比,后三列采用劳均工业增加值之比。考虑到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于企业就业影响的滞后效应,即当期就业情况受上一期发展战略影响,表 2 的第(1)列和第(4)列报告了将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其滞后一期值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滞后的技术选择指数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人数,说明政府发展战略对于企业就业的影响是持续的,进一步强调了政府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对于地方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政府赶超战略主要导致资本密集型重工业违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因而有必要对用以度量发展战略的核心解释变量指标 TCI 进行调整,将分子由所有工业企业加总缩小为重工业企业加总,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2 的第(2)列和第(5)列,核心解释变量仍显著为负。最后,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规模以上”企业的标准在 1998—2013 年期间发生变化,本文在表 2 的第(3)列和第(6)列将回归样本

表 1 政府发展战略对就业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技术选择指数	-0.040 *** (0.002)	-0.031 *** (0.002)	-0.036 *** (0.002)	-0.039 *** (0.001)	-0.043 *** (0.001)	-0.038 *** (0.001)
利润率	0.220 *** (0.006)	0.219 *** (0.006)	0.221 *** (0.006)	0.229 *** (0.006)	0.222 *** (0.006)	0.224 *** (0.006)
成立年限	0.149 *** (0.002)	0.149 *** (0.002)	0.147 *** (0.002)	0.146 *** (0.002)	0.147 *** (0.002)	0.146 *** (0.002)
企业出口	0.019 *** (0.000)	0.019 *** (0.000)	0.019 *** (0.000)	0.019 *** (0.000)	0.019 *** (0.000)	0.019 *** (0.000)
企业市场份额	15.030 *** (0.174)	15.060 *** (0.174)	14.932 *** (0.174)	14.806 *** (0.173)	14.940 *** (0.174)	14.877 *** (0.174)
企业资本密集度	-0.258 *** (0.001)	-0.258 *** (0.001)	-0.257 *** (0.001)	-0.257 *** (0.001)	-0.258 *** (0.001)	-0.257 *** (0.001)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数	2 442 749	2 442 749	2 442 749	2 442 671	2 442 671	2 442 671
R^2	0.158	0.158	0.151	0.154	0.157	0.154

注:回归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表 2 政府发展战略对就业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技术选择指数	-0.037 *** (0.002)	-0.012 *** (0.001)	-0.032 *** (0.002)	-0.041 *** (0.002)	-0.008 *** (0.001)	-0.045 *** (0.002)
利润率	0.202 *** (0.007)	0.222 *** (0.006)	0.290 *** (0.010)	0.205 *** (0.007)	0.224 *** (0.006)	0.293 *** (0.010)
成立年限	0.114 *** (0.002)	0.147 *** (0.002)	0.165 *** (0.002)	0.113 *** (0.002)	0.148 *** (0.002)	0.163 *** (0.002)
企业出口	0.019 *** (0.000)	0.019 *** (0.000)	0.015 *** (0.000)	0.019 *** (0.000)	0.019 *** (0.000)	0.015 *** (0.000)
企业市场份额	14.022 *** (0.186)	14.904 *** (0.174)	12.966 *** (0.192)	13.979 *** (0.186)	14.891 *** (0.174)	12.864 *** (0.192)
企业资本密集度	-0.270 *** (0.001)	-0.257 *** (0.001)	-0.288 *** (0.001)	-0.270 *** (0.001)	-0.258 *** (0.001)	-0.288 *** (0.001)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1 726 087	2 442 749	1 524 151	1 726 080	2 442 671	1 524 124
R ²	0.128	0.153	0.098	0.131	0.156	0.098

注:回归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限定在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负,说明样本筛选标准的变化对于模型的主要结论没有实质性影响。

3. 异质性分析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往往不由地方省级政府直接管理,而隶属于更高级别的中央,因而当地发展战略对其影响不大;且作为国有企业总是得到更多政策扶持与资源优待,生产经营规模更大,也承担着更多吸纳就业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人数的负向影响可能存在不同的效果。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异质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3 第(1)(2)列所示^①,此处选用省工业劳均资本存量与省劳均资本存量的比值来计算技术选择指数。可以发现,第(1)列基于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不再显著,而第(2)列基于非国有企业样本的结果中技术选择指数的系数仍保持 1% 水平下高度显著,这验证了上面的猜想——作为中央直属机构和各种就业帮扶政策的承接地,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不受政府赶超战略的负面影响,非国有企业成为这种就业挤出效应的主要承担者。

表 3 政府发展战略对就业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国有企业	(2) 非国有企业	(3) 东部地区	(4) 中部地区	(5) 西部地区
技术选择指数	-0.007 (0.004)	-0.033 *** (0.002)	-0.060 *** (0.004)	-0.021 *** (0.002)	-0.028 *** (0.004)
利润率	0.023 ** (0.009)	0.347 *** (0.007)	0.308 *** (0.008)	0.121 *** (0.013)	0.085 *** (0.013)
成立年限	0.069 *** (0.004)	0.126 *** (0.002)	0.154 *** (0.002)	0.132 *** (0.003)	0.135 *** (0.004)
企业出口	0.023 *** (0.001)	0.017 *** (0.000)	0.020 *** (0.000)	0.012 *** (0.001)	0.021 *** (0.001)
企业市场份额	10.044 *** (0.327)	15.307 *** (0.195)	19.725 *** (0.333)	14.604 *** (0.314)	10.646 *** (0.263)
企业资本密集度	-0.334 *** (0.005)	-0.252 *** (0.001)	-0.261 *** (0.001)	-0.242 *** (0.002)	-0.265 *** (0.00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263 406	2 179 343	1 664 698	486 066	291 985
R ²	0.020	0.178	0.167	0.188	0.132

注:回归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①所有制按照企业实收资本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划分,并根据注册类型对法人资本企业的所有制进一步细分。

鉴于此,本文引入各省人口密度作为技术选择指数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从 Lin 等将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作为国家层面技术选择指数的工具变量^[8]中得到启示,一方面,各地人口密度越大,其人均自然资源越少,越难以在维持人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支持资本密集型战略的实施,因而政府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的程度越轻,技术选择指数也越小,即人口密度与技术选择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反映一个地方人口特征的前定变量,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排他性,因而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分别以工业劳均资本存量和劳均增加值衡量的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全样本和分企业所有制的回归。由于检验结果显示最小特征统计量大于 10,在 10% 置信水平下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而此工具变量的选用不存在弱识别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仅报告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采用何

种方法计算核心解释变量,全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下的结果均显著为负,而国有企业样本下的技术选择指数不显著。这说明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仍然导致了企业就业人数的显著减少,且正如异质性分析中所得出的,这种负向影响不适用于国有企业。

5. 进一步讨论:市场化渠道

根据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政府总是通过提供信贷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方式扶持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从而挤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因此,为检验是否在市场化程度更低、政府干预强度更大的地区,偏离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负向影响更强,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市场化指数与技术选择指数的交互项。为缓解交互项与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在回归前先对技术选择指数与市场化指数进行去中心化处理。表 5 报告了渠道检验的回归结果。此处使用基于工业企业劳均资本存量计算的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全样本和按企业所有制划分的子样本进行回归。从表 5

表 4 政府发略对就业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1) 全样本	(2) 全样本	(3) 国有企业	(4) 国有企业	(5) 非国有企业	(6) 非国有企业
技术选择指数	-0.511 *** (0.068)	-0.226 *** (0.029)	-0.439 (0.341)	-0.308 (0.239)	-0.351 *** (0.057)	-0.184 *** (0.030)
利润率	0.185 *** (0.008)	0.224 *** (0.006)	0.003 (0.019)	0.024 ** (0.010)	0.321 *** (0.009)	0.348 *** (0.007)
成立年限	0.140 *** (0.002)	0.137 *** (0.002)	0.076 *** (0.008)	0.065 *** (0.005)	0.121 *** (0.002)	0.120 *** (0.002)
企业出口	0.018 *** (0.000)	0.017 *** (0.000)	0.023 *** (0.001)	0.022 *** (0.002)	0.017 *** (0.000)	0.016 *** (0.000)
企业市场份额	15.276 *** (0.194)	14.733 *** (0.178)	10.334 *** (0.415)	10.106 *** (0.342)	15.596 *** (0.209)	15.152 *** (0.198)
企业资本密集度	-0.254 *** (0.001)	-0.257 *** (0.001)	-0.326 *** (0.008)	-0.332 *** (0.005)	-0.251 *** (0.001)	-0.252 *** (0.001)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2 442 749	2 442 671	263 406	263 399	2 179 343	2 179 272
R ²	0.036	0.126	0.006	0.019	0.086	0.156

注:回归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表 5 政府发展战略对就业的影响:市场化渠道

变量	(1) 全样本	(2) 国有企业	(3) 国有企业	(4) 非国有企业	(5) 非国有企业
技术选择指数×市场化指数	0.001 ** (0.000)	0.002 (0.001)	0.000 (0.001)	0.003 *** (0.001)	0.004 *** (0.001)
技术选择指数	-0.035 *** (0.002)	-0.007 (0.006)	-0.007 (0.006)	-0.036 *** (0.002)	-0.028 *** (0.002)
市场化指数	-0.000 (0.002)	-0.011 *** (0.004)	-0.006 (0.004)	-0.022 *** (0.002)	-0.007 *** (0.002)
利润率	0.221 *** (0.006)	0.024 *** (0.009)	0.023 ** (0.009)	0.353 *** (0.007)	0.346 *** (0.007)
成立年限	0.147 *** (0.002)	0.068 *** (0.004)	0.069 *** (0.004)	0.125 *** (0.002)	0.125 *** (0.002)
企业出口	0.019 *** (0.000)	0.024 *** (0.001)	0.024 *** (0.001)	0.017 *** (0.000)	0.018 *** (0.000)
企业市场份额	14.934 *** (0.174)	10.023 *** (0.328)	10.041 *** (0.327)	15.252 *** (0.195)	15.313 *** (0.195)
企业资本密集度	-0.257 *** (0.001)	-0.334 *** (0.005)	-0.334 *** (0.005)	-0.252 *** (0.001)	-0.252 *** (0.001)
其他控制变量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数	2 442 749	263 406	263 406	2 179 343	2 179 343
R ²	0.150	0.015	0.020	0.181	0.177

注:回归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中可以看到,基于全样本以及非国有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技术选择指数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均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技术选择指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国有企业子样本中技术选择指数与交互项均不显著。分样本回归结果在不加入省份层面控制变量时依然成立。这表明,市场化程度更低、政策力度更强的地区,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对企业就业人数的挤出效应更强;且如前文所述,这一渠道也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

六、结论和建议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框架对中国1998—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政府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于企业就业人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且在引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中依然成立。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成为这种挤出效应的主要承担者。此外,在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对于企业就业人数的负向影响更强。综上所述,政府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对于就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经验分析表明市场化程度是政府发展战略影响企业就业的一个渠道,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信贷歧视和财政资源错配,尤其是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要素相对价格能够客观反映其稀缺程度,有助于缓解资本密集型企业优先发展的就业挤出效应。2020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的意见》中也指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加强要素价格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应该因势利导,大力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对于作为就业挤出效应主要承担者的非国有企业,应给予足够重视,充分释放其就业吸纳能力。而要实现发展战略从违背比较优势到遵循比较优势的转变,必须改革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经济竞争,真正构建“有为的政府”。

参考文献:

[1] DEMOGLU F. Technical change, 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8, 36: 5-6.

[2] 朱轶,熊思敏.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就业效应的经验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26(5): 107-119.

[3] CAI F, WANG M Y.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ployment in transitio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 71-81.

[4]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70(6): 5-15.

[5] 康志勇. 赶超行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的数据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1): 60-69.

[6] 林毅夫.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 经济学(季刊), 2002, 2(1): 269-300.

[7] 付才辉,郑洁,林毅夫. 发展战略与高储蓄率之谜——一个新结构储蓄理论假说与经验分析[J]. 经济评论, 2021(1): 49-67.

[8] LIN Y F, WANG X.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R].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No. E201900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19.

[9] 陈斌开,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4): 81-102.

[10] 邓宏图,徐宝亮,邹洋. 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 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J]. 经济研究, 2018, 53(11): 17-31.

[11] 姜磊,姜煜,赵秋运,等.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 42(5): 103-112.

[12] 姜磊,吴清扬,赵秋运,等. 比较优势与企业退出: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R].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系列; No. C2020001. 北京: 北京大学, 2019.

[13] 姜磊,郭玉清,刘梦琰. 比较优势与企业杠杆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6): 146-156.

[14] 邵敏,包群. 出口企业转型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与工资的影响: 基于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2011, 34(6): 48-70.

[15] 郭长林. 财政政策扩张、异质性企业与中国城镇就业[J]. 经济研究, 2018, 53(5): 88-102.

[16] 毛其淋,许家云. 市场化转型、就业动态与中国地区生产率增长[J]. 管理世界, 2015(10): 7-23.

[17] 李磊,白道欢,冼国明.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 ——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6, 51(8): 144-158.

(责任编辑:张志琴)